

# 水污染的社会文化机理探索

——人类学学者访谈之五十二

□秦红增/问, 陈阿江/答

[摘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过, 伴随这一现代化跃迁而来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尤其是在苏南等经济先进地区, 水资源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 已成为影响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安康的顽疾, 相应的如何解决以实现“人水和谐”便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而探析其中的社会文化机理, 从解决人的问题入手以解决水污染问题则是一条有效路径。

[关键词] 水污染; 环境影响评价; 社会文化机理; 人水和谐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09)04-0026-07

## A Probe in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Mechanism of Water Pollution

——An Interview with the Anthropologists (52)

QIN Hong-zeng, CHEN A-jiang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He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has witness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its economy and society. However, such modernization also brings along with aggravat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particular, in the economically advanced areas such as the southern part of Jiangsu Province, water resources have been polluted to an unprecedented degree, which has become a chronic problem affecting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life and health of the people. Accordingly, how to settle the problem and to achiev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water resources has become a great concern of the world. The paper argues that an effective measure is to understand its social and cultural mechanism and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water pollution by settling human-related problems.

**Key Words:** water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ocial and cultural mechanism;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water resources

秦 红增(简称秦): 陈教授您好! 非常高兴您能够接受本刊访谈。首先祝贺您, 最近被选为中国社会学学会人口与环境社会学学会的副会长。正如我们以前聊过的,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 主要聊聊您的学术经历与体会……

陈阿江(简称陈): 非常感谢贵学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中国人类学界颇有影响的这份杂志上作访谈。称人类学家不敢当, 严格意义上讲, 我并没有人类学的文凭。当然, 我个人是很喜欢读人类学的作品, 也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如果不是把社会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进行严格区分的话。

### 一、随兴趣而改专业

秦: 我知道您以前在大学里是学习工科的, 但为什么后来转向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呢?

陈: 我高中的时候数理化成绩都挺好, 尤其是化学, 我是非常喜欢化学的。喜欢化学那种变化无穷的“化”之神奇。我从小也喜爱文学作品, 只是高中的时候, 大量时间去做数理化习题, 所以没有时间去读文学作品了。这样的条件, 在当时的情景下, 我自然要选择理工科了。大学及专业都没有选好, 所以进门以后心理落差很大。可能因为高中

阶段太辛苦,进大学以后又衔接不好,适应也差,所以一个学期后我就生病了。休了一年多时间的学。十八九岁的年龄,感受和体验了生命之极限——那时我身体和精神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根据我的身体情况和我自己的真实愿意,我当时是不想再复学了,但这样的身体在家也是个问题,所以最后我还是去了学校。多年后我的同学和我聊起,说你当时在学校走路的样子很像是一个老头——体质极差,走路抬不起腿来,只能慢慢移步……后来,一次偶然的机,我在同学小李的宿舍里看到一本气功书,说对神经衰弱、饮食不佳等等有辅助作用,这对我来说燃起了一点希望。而我的那个同学小李——现在在加拿大,是个很有天分的人——那时正在自学“鹤翔功”。不过他练习的是动功,既有收益,也有“走火入魔”的风险。后来我自己选择了一种叫“因是子静坐法”的静功,通过气息调整、神经系统的锻炼,身体逐渐好起来。

秦:没有想到您还有这样一段特殊的体验。

陈:我之所以要说起这一段经历,是因为它与我后来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学术道路都有很大的关系。首先,生死之边界性体验,会极大地影响人,影响人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与人生道路的选择,比如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生死考验的人,比别人会多一层体验。第二,从积极的意义上讲,疾病就像一所学校,让你体会到很多,对身体的看法、对健康的看法,甚至对人间、对社会的看法,都可能获得普通人不大容易获得的体验。第三,对气功以及与此相关的道家学说、佛教等中国传统文化的领悟。

秦:那您是怎么选择考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的呢?

陈:从专业上讲,从理工农医类转成社会学的,甚至成大家的,中外均大有人在,所以不应该有什么障碍。我工作之初,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文学、历史等专业领域里的书我都看,很喜欢,读了以后,感觉比原来的学业视域宽得多,很有意思。比较之后,我选择了社会学。社会学既有人文学科的特点又有科学(science)的特征。社会学的科学特征,比如方法方面有与自然科学相通的一面,正是我改学它的一个潜在优势。选择社会学还有一个地缘上的因素。我是江苏吴江人,中国社会学史上,吴江出了两位社会学名家,一位是费孝通,另一位是孙本文。我学习和理解社会学是从读费孝通先生的作品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费以及由他破题而形成的作品,如小城镇研究等,大量出版,另外费的旧作也陆续重印。费的文笔很吸引人,他写的事情又正好是我熟悉的,他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老百姓经常关心与议论的事。比如,兔毛的价格猛涨猛跌等等。所以我我觉得,社会学很有趣,也尝试去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费的作品是我入门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是一开始就学“人类学”的,哈哈……

秦:是啊,看来叫什么似乎不是很重要。

陈:1991年我报考了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上了线没被录取。后来自己联系转到了西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当时国内社会学硕士点比较少,所以我只好暂时

“寄居”在其他专业里,毕竟文科专业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而且这样的学习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难得。我的导师唐能赋教授是搞伦理学的,当时是四川省伦理学会的会长。他是改革开放后四川最早搞伦理学的,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随罗国杰教授学习过,同期的一批学者中,如湖南师大的唐凯麟,他们是很好的朋友,经常有合作。但当年西南师大伦理学也没有点,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里。唐老师对我很宽容,允许我继续搞我喜欢的社会学(当时多数老师不这样宽容的),所以我继续看社会学/人类学的书。硕士论文是关于农村家庭变迁的,也是社会学/人类学里最基础的部分。我的目标就是要继续学社会学。

秦:所以,您是“借寄”在别的专业里,继续学习社会学的?

陈:那时,我太想学社会学了。当然,对工作多年的人,读书的机会也倍感珍贵。所以,研究生我是很用心读的。虽然对本专业没有学得特别好,但是有两个方面的训练对我后来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著作选读》等通读了一遍。我想知道马克思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但那时确实不是很理解那些经典文献,只是把“书路”走了一遍。在西南师大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是一句一句地读的,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但我自己感觉我真理解马克思是到了美国以后,看到了美国这样的“理想类型”的资本主义,并且经常与美国朋友讨论,才明白的。第二方面,学习了伦理学。因为唐老师是搞伦理学的,所以我把伦理学的东西好好地看了一下,阅读(有的是浏览)了他在当时的全部作品。现在,我对我的研究生说,你们要想有所突破,就必须首先突破我这个“绊脚石”——不管我是一座高山还是一块石头,我就在你们面前“绊脚”,你们必须超越我。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重庆的另外一个收获,是对区域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了解。四川的巴山蜀水,养育了非常独特的地域文化,所以重庆的三年,现在想来,还是有很多的体验的。

## 二、农村发展研究

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士?

陈:是的。当时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和北京大学两个单位招社会学博士。社会学所只有陆学艺先生一位导师招博士生。陆老师是搞农村社会学的,正是我喜欢的领域。我跑到社会学所去,正好沈原老师在,聊了大概有两个小时,感觉很好。也见到了陆老师,他送了我两本书。这样我就报考了社科院。录取后,因为那年增加了几位导师,所以,我最后随张琢先生学习中国现代化。

秦: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吴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

陈:是的,我博士论文是关于盛泽“丝绸经济圈”的发展研究。中国的区域发展是不平衡的。历史上,江南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税赋也主要来自江南地区。进入近代以后,上海开埠,江南得上海开埠之便捷,所以改革开

放之后苏南发展得很快。我的家乡吴江在太湖的西南岸,历史上属于苏州府(后来的苏州地区/市),与嘉兴、湖州相邻,是江南的鱼米之乡,并形成了种桑—养蚕—缫丝—织绸—丝绸贸易这样农副工贸的传统。近代采用机器生产以后,农村地区传统的丝织业大多衰落,如以丝市闻名的南浔、震泽,以及以绸业闻名的濮院等,历史上的丝绸业风光不再,但唯独盛泽,不仅绸业得到了发展,而且随着原料由天然丝到合成化纤的拓展,以化纤为原料的丝织业得到了极度的发展。所以我的论文,实际上是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丝绸圈”的经济发展问题。

秦:您的博士论文中有不少原创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比如关于“技术傻化”的观点就非常引人注目。

陈:做农村研究的学者,特别是关心农村技术进步或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学者,觉得“技术傻化”的概念很有意思。关于农村技术进步的文字是多年前发表的,但其中我“炮制”一些概念现在还时常被人提起。2008年我在长春的社会学的年会上遇到一位农大的老师,还问我有没有继续在做“技术傻化”的研究了。我说除了那个续篇《技术傻化的社会学阐述》,就再也没有新东西写了。另外,我的一个研究生,在我的指导下,以“傻化技术”为主要切入点完成的《“土专家”的傻瓜技术及其效益》获得第十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秦:所以,看来您原创的“技术傻化”概念还很有生命力。另外,我也注意到您的博士论文中关于人民公社遗产的研究。

陈:我的研究发现,苏南20世纪80~90年代的乡镇工业发展,与早期的人民公社制度有继承关系。比如,人民公社组织的集体生产的劳动制度,我称之为“准工厂制”后来很好地延续至社队工厂/乡镇企业里。细节我就不说了。

秦:很有意思的是,您用了生产队时期的工分记录,对当时的劳动进行了量化研究。

陈:我觉得工分记录是很重要的一手文献资料,有许多可以开发的内容。在中国,无论是单个企业或区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高密度劳动投入往往是经济起飞阶段的重要因素,而20世纪70年代工分记录恰恰提供了这样非常精确的量化数据。

秦:所以我注意到《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常务副主编吴增基教授在为您的专著《制度创新与区域发展》写的书评中,对您的研究有极高的评价。这里我引用他的一些话。他说:“书中有不少的观点或概念具有原创性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对水域污染的分析与解释,‘准工厂制’的提出及对人民公社遗产的客观分析、农村技术进步机制的探讨,‘傻化’概念的提出,等等”。他还说:“我认为他所原创的‘傻化’概念是具有很强学术生命和学术价值的,而关于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则将成为后人研究国内环境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重要参考文献”。看来他的预测很准。

陈:关于水污染的社会学解释那篇文章,正如吴老师

说的,它大概是国内关于水污染社会学研究的最早的一篇文章,现在几乎成为环境社会学专业做水污染研究必读的文献。

秦: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

陈:我那时是研究发展、研究现代化的。但社会学专业与经济学专业不一样。大的方面讲,经济学关心效率问题,社会学关心公平问题。所以,作为社会学专业的人,我不仅会关心经济增长中的人与社会,也会关心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当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在一般现代化进展中,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贫富分化,但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南的贫富分化问题还不是很突出,至少从表面上看如此。但水污染的问题已经存在,部分地区已经凸显了。与贫富分化问题不同,水污染问题被某些特别的因素掩盖起来,所以当时几乎没有人从社会的角度去关注和探讨水污染问题。我当时是把水污染这样的环境问题作一个社会问题进行研究的。

秦:所以您的关于水污染的社会文化研究开了此类研究的先河?

陈:我的博士论文,即您前面提到的那本著作,一共有7章,其中有2章,即“第二章 圩田系统”和“第七章 生态失衡问题”是关于水环境与水污染问题的。后来据此内容改写的文章《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如果在网络上搜索一下,您会发现它的引用率确实很高。

秦:您还有一篇关于劳动力流动的文章,也被广为引用?

陈:在北京期间,我除了参加社会学所老师的课题研究外,还参加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杜鹰研究员和白南生研究员主持的福特基金会“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的研究。参加这个劳动力流动课题的研究,收获很大。

秦:博士毕业后,您准备继续做水污染的研究,所以就去了河海大学?

陈:这是被建构的一个话题。河海大学是一所以水研究见长的大学,我现在又做水污染研究。所以我经常被问起,因为我在河海大学,所以我做水污染研究。如果问我什么是“社会建构”,我想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我满腔热忱地做了几年苏南的发展研究,如果再继续做感觉很难有新发现了,所以我想尝试个新的领域。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人。跑到河海大学移民研究中心,准备做三峡移民,或者说准备做水库移民的社会学研究。

### 三、项目中的社会/文化研究

秦:所以,您就开始了水库移民,或者称为非志愿移民的社会文化事项的研究?

陈:水库移民/工程移民/非志愿移民的研究,我的确做了一些,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在美国的《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上发表。也为诸如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机构做过一些研究,如2002年的世界银行给了我一个研究任务“The World Bank Sponsored Empirical Research: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但我自己感觉我还没有做出应做出的成果来。一方面是感觉时间不够用——老是感觉时间不够用,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深入地研究水库移民的问题,实际上的难度比我们预想的要难得多。当然,我这里指的是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研究,而非经济补偿问题。我有一个愿望,某一天,我到三门峡库区的某个村落,做一年,或者至少半年的田野研究,以宏大的社会变迁为背景,以移民安置为干涉变量,展示一个村落居民生活的变迁史。

秦:这应该可以做成地道的人类学研究,我们期待着您早日做出这样的成果来。

陈:我到河海大学另外一个当时没有预期到的研究领域是社会评价,英文是 Social Assessment。我当时是冲着水库移民到移民研究中心的,但后来的主要精力集中到项目社会评价上。我去河海大学之前,施国庆教授等人已经承接了你们广西百色水利枢纽的“移民安置规划”的任务。1998年世界银行项目准备团去广西,施教授派我去百色,让我关注一下“移民安置规划”任务中有关少数民族的问题。正巧,当时世界银行开始重视项目中的社会文化事项,并且要求在项目准备中加进社会评价的研究。世界银行项目准备团中有一位成员是人类学家林宗成先生,在项目准备团这样的以工程、财务为主流的人员结构中,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人员就显得非常稀有。我与林博士一见如故,谈得挺投机。后来我们承接了百色水利枢纽项目的社会评价研究,去百色做田野研究。百色项目开启了我个人学术履历的新阶段。

秦:看来,您的人类学研究与我们广西是有缘分的。

陈:是的。很有缘分。

秦:那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百色水利枢纽项目的社会评价研究?

陈:好的。在当时,社会评价研究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没有什么“模板”可以参照。我当时做百色项目社会评价时,调查的基本功靠的是我以前做实地研究的基础,包括我做博士论文的实际锻炼,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的锻炼。项目社会评价研究,所需要的基本功是与社会学研究或农村调查是一致的,但在研究中必须时时关注项目这个干涉变量,并且以此作出判断。所以,田野研究下来我已是心中有数了。

秦:从此您就做社会评价的研究?

陈:是的,我原来是计划到移民中心做移民研究的,结果项目中的社会评价研究成了我的主业。这是典型的路径依赖……自百色之后,受林宗成博士的邀请,我接着参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项目”的社会评价。后来受世界银行另一位专家张朝华的委托,完成了“中国水产发展项目”的社会评价研究,等等。当时没有太多先例,所以我的一些报告被广为传阅、参考,包括当时的世行北京代表处的专家。

秦:您简要给我们讲讲项目的社会评价?

陈:我在最初发表的那篇文章《社会评价:社会学在项目中的应用》,是这样定义项目社会评价的:“以项目区人口及相关人群的社会发展为基本的出发点,综合应用社会学、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系统的实地调查,分析项目中的重大社会事项,从社会方面给出项目是否能够成立的基本判断。如果项目可以成立,则需要给出项目实施过程中重大社会事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社会分析,提出相应的社会发展策略与建议,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发展。”现在觉得这个定义只是限于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或世界银行所说的项目准备阶段,实际上社会评价还应该包括其他阶段。说实话,我对什么是项目社会评价的理解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

秦:那么,您觉得对项目进行社会评价研究有什么意义呢?

陈:可以从两方面说。从项目影响人(Project Affected Persons)方面看,通过社会评价,可以减少项目影响人的负面影响。对项目业主而言,可以消除潜在的隐患,降低社会风险,使项目产生稳定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世界银行曾经做过一项统计,在已完成的57个项目中,30个项目进行过某种形式的社会分析,平均获得18.5%的经济回报率,27个项目没有或几乎没有社会分析,经济回报率低于9%。

秦:印象中您曾经完成过一个叫“项目社会学”课题。请问,“项目社会学”是指什么?

陈:是的,因为有多年的田野工作和发展项目的社会评价研究经历,我自己有一些体会和想法,所以2002年申请到了河海大学科技创新重点项目,想写一本叫《项目社会学》的书,想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系统地阐述一下什么是社会评价,社会评价的方法论、基本理论、视角以及实际的操作等。我把其他的事都搁置一边,写了半年时间。后来实在是因为时间不够用,所以稿子基本完成,但我自己很不满意,所以一直没有正式出版。

秦:您能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项目社会学?

陈:我所认定的项目社会评价是社会学/人类学范式的社会评价,而不是技术/经济范式的社会评价。我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上的那篇文章,就是关于社会评价的范式讨论。沿着社会学/人类学范式的社会评价的路子,并进行拓展,就是我所说的“项目社会学”。我想“项目社会学”除了坚持社会学、人类学范式的社会评价这个内核以外,还需要对以下几方面进行拓展。

首先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拓展。我原来只认定社会评价为社会学/人类学在项目实践中的一个新的应用领域,按照我现在的认识,实际上“项目社会学”不仅要为完善实际的项目服务,而且还有许多没有解决的理论、方法论问题需要进行研究。

其次是研究范围的拓展。我曾提出“项目社会”的概念,社会学/人类学范式的社会评价研究对象是一整体的社

会,“项目社会”虽然与地域有联系,但就本质而言,它并不是某一地域上所有人群所构成的社会,而是在某一地域内,项目影响所及的人群所构成。项目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是因为项目介入后,使相关人群形成了一个有联系的整体社会。当然,这个项目还仅仅是一个投资项目,实体的概念。但就方法论上讲,社会评价的方法是可以超越具体的投资项目这样一个比较狭窄的领域而可以扩展到“活动/事件”这样更为一般的人类生活领域。我最近发表的关于水污染事件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的文章,就是对此拓展的一个实例。“利益相关者分析”是项目社会评价中普遍应用的分析工具,而我把它应用到水污染事件这样一个非投资活动的领域,我认为作为一个视角,它是同样适用的。甚至我可以把“三鹿奶粉事件”当成一个项目(事件),然后对其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社会学/人类学的分析,纳入“项目社会学”的范畴。

再次是过程的拓展。我们最初从事的社会评价研究是项目可行性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与技术可行性、财务分析、国民经济评价、环境影响评价平行的一块。项目可行性研究主要是针对新设计开工的项目,那么设计、开工以后,过程里是否还有问题需要解决呢?竣工以后是否还有社会事项需要解决呢?复杂项目的社会文化问题往往滞后表达。比如,三门峡大坝建成已半个世纪了,但水库移民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对于有些项目,项目竣工是社会事项可能才刚刚浮出水面,所以随后的跟踪研究,对完善项目,特别是对改善项目影响人,具有重大的意义。当然,这还是仅仅从为项目服务的应用角度来考虑的。实际的认知和发展过程远比这样的情景复杂。

秦:为什么呢?

陈:我举例说吧。比如2003年某州要做“生态移民安置规划”,我被邀请作咨询专家。轮到我要发言的时候,我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今天是当作移民专家被邀请来的,但我的基本观点是:不要轻易地谈移民,能不移民的就不要移民,能少移民的尽量少移民;如果一定要移民的,一定要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认真调查研究后再决策。这样的话对做移民规划准备申请国家资金的利益相关者,当然是不爱听的话。但我这样说,是基于我对大量项目影响人的研究得出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今天参加一个新项目,提出关于社会文化事项的判断,一方面是根据新项目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对以往已经完成项目的大量基础性研究,总结得出一般规律,而后才给出的。

秦: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些看似操作性的项目,有很多基础性研究要做?

陈:是的,是这样的。

秦:在您的谈话里,反复提到“影响”一词,是否有特别的意义?

陈:我觉得我们实际上做的是影响研究,所以——或许叫“影响评价”或恢复为“社会影响评价”更加贴切。我们现在用的“社会评价”主要是从世界银行的“social assess-

ment”翻译过来的,翻成社会评价或社会评估关系都不大。

您知道,环境学科里是做“环境影响评价”的研究,早期的“社会评价”也被包含在“环境影响评价”里的。我在美国访问研究的时候知道,美国学者仍然保留用社会影响评价“social impact assessment”这个词。在英国,出版了一本专门的杂志叫“影响评价研究”,在这个杂志里除了环境影响评价,也包括社会影响评价。在一些人眼中,环境影响本身就包含着社会影响的,社会影响是作为部分被包含在环境影响里的。

所以,我们不妨作一个概括:人类的活动/事件(投资项目是人类活动中的特殊类型)——> 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群体关系变化/社会结构性/文化变迁等——> 人类社会如何应对?这就是社会评价或项目社会学关注的最一般逻辑。

#### 四、水污染的社会文化解释

秦:我注意到,您近几年转向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就像您当初从热门的苏南发展研究,突然转向项目相关的研究,而且主要是西部的研究——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而现在又“杀回”江南,而且是环境领域的研究。请问,这是一系列跳跃式的研究,或者其中有必然的联系?

陈:也有朋友这样问我,或者这样评论我,觉得我研究的领域变化挺快。这可从三个方面来说。首先这样的变化与我的个性有关。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人,喜欢去尝试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当然,这样跳跃的结果,会使积累起来的“财富”丢失,而且这样的“折腾”也很辛苦。或许我生就一个“劳碌命”。如果一个事情我已经明白了,再继续做下去,我就觉得没有干劲,没有味。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领域是有关联的。比如,我以前学过的工科,是我目前研究环境社会学的重要的背景知识,对农村社会的理解和中国整体社会的体悟,是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基础,而项目中社会文化事项的研究,加深了我对现代性的理解,储备了对现代性批判的背景、知识和自信。所以这样的跳跃,在我个人的认知实践中是有联系的。再次,我关注的研究领域与中国社会整体变迁进程是密切关联的。您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是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苏南农村发展无疑是一个前沿地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开发力度加大,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在中国的投资力度也比较大,与此同时,政府、社会对人更加重视,所以项目的社会评价,包括移民安置中的社会文化方面的事务也得到了重视。至于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也是与当今中国的现实密切关联的。

秦:愿闻其详。

陈:第一个是宏观背景。我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大致需要200年时间,即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动卷入现代化——我喜欢用被动卷入这个词——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邓小平所预言的中等发达国家的程度,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其中,以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前一个世纪,中国主要解决独立问题,而后一个世纪呢,主要解决富强问题。我个人认为,这后一个世纪,又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不妨称之为“前发展”、“发展”和“后发展”。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可以称之为“前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发展”阶段,开放政策30年后的今天,某些东部地区研究进入“后发展”阶段,但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像太湖流域这样的经济先进地区,环境问题就是“后发展”阶段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秦:您谈到的两个世纪、三个阶段,对我们整体地理解中国社会的演进很有帮助。我也注意到了,其实您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您说的“发展”阶段时期,已经研究“后发展”阶段的水污染问题了。

陈:这就是我要回答您的我为什么要研究水污染的现实动机——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是因为我和我的乡亲们“运气”不佳,最早遇到“没水喝”的困境,所以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做博士学位论文时就关注和研究水污染问题。苏南是先发展地区,所以环境问题也先于其他地区“冒”出来。您知道,我是在水乡出生的人,从小对水有很多的接触与体悟;以后常常回老家,与家人、亲朋好友聊天时,自然会听到水质每况愈下的话语。其实,我一直希望水能慢慢好起来,但越是期盼,越是失望——水体越差,从水不能喝、鱼虾不能吃,到水不能洗衣、洗拖把……另一方面,政府似乎也很重视,1998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零点行动”。但在民间的实际情形是,1998年以后,水体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日益呈现恶化的趋势。所以,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以后,表面上我没有继续投入大量时间做苏南的研究,但十余年间我一直在关注太湖流域的水况,内心一直思索着太湖流域的水问题。2004年,我申请的省社科基金被批准,我就开始专心于水污染问题的研究。

秦:请问陈教授,您研究水污染的重点是什么?

陈:我的侧重点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水污染进行解释。我想知道为什么水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被污染了?为什么我们历史上那么长时间里人与水的关系是基本融洽的?为什么政府大量投入的治污无效,或者基本看不到效果?为什么我们用的是工程师的治水思路?等等。

秦:您为什么要解释呢?“解释水污染”与“解决水污染”之间是什么关系?

陈:您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我是水乡的人,所以我想我是最期盼水污染问题得到解决的人之一。如果水污染问题解决了,我就不需要去做任何的解释。带着“什么时候我和我的家乡人有安全清洁的水喝、有鲜美的鱼虾吃”这样一个朴素的问题,观察各利益相关者的行动与博弈。在这漫长的观察及与各方的交流过程中,我慢慢地体会到,实际上相当多的人对水污染视而不见,没有意识到水污染的严重性及其后果,治水的人基本上没有搞清楚水污染的社会机理,相当多的人没有……对待水污染问题,社会科学家可以有两方面的作为,一是进行基础研究,从学理层面上搞

清楚,即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一是为政府或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设计,即“怎么办”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不缺乏政策建议和设计,一篇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就可以为您提供一大堆的政策建议。但真正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或设计有没有?就像某些医生在没有了解到真实的病情时就已经开出了一大堆药一样,我们很多的处方不是建立在详尽的研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想象”基础上。有位资深的教授告诉我,目前,我们还拿不出一套完整的关于太湖流域水质的数据。如没有水体污染的基础数据,工程技术解决方案的依据是什么?自然科学、技术方面尚且如此,社会方面更是可想而知了。所以我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于理解、解释水污染的社会文化机理。

秦:您认为认知更重要吗?

陈:关于“知”与“行”的关系,孙中山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中国的问题“知难行易”。当然简单地比较“知”“行”的难易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对象水污染这样的重大问题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规律性的研究探索很不够,这是事实。所以,作为学者,首先要把基本问题搞清楚。

秦: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严重的水污染呢?

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两章,后来修改以《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人大《社会学》2000年第6期转载)发表,这是我想作解释的一个企图。最近陆续发表了《水污染事件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分离》、《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以及在贵刊同期发表的文章等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对水污染问题作出社会文化的解释。详细内容我就不介绍了。这些成果最终汇成一本书,预计年内可以出版。

秦:我和其他读者一样,期待着您的这部著作的出版。不过在您的这部著作正式出版之前,您是否可以简要地给我们介绍一下?

陈:解释水污染是我的主要目的。拟出的这本书从四个部分进行了分析。第一部分,我以太湖流域的两个重大污染事件为案例,以利益相关者为视角,分析水为什么会被污染、污染问题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解决。第二部分,我主要分析了水污染的发生发展历程:城市污染下乡、本土工业污水泛滥,使水域急剧恶化。村民在水污染解决无望时,无意中使用了、开发了水体的低级功能——纳污功能,变传统的保护者为现代的污染者,从物质污染演变为“精神”污染。村落的外源污染不仅污染了村落的水域,而且导致了村落的内生污染。“内生污染”的形成昭示着治污的难度。第三部分,我主要是对目前的治水范式进行分析、批判。我把目前的治水的范式简要地归纳为“运动范式”、“技术范式”和“地方主义范式”,根据我给出的这些“命名”,您就不难理解了。第四部分,我主要从社会文化/历史层面解释水污染问题,这个解释框架,实际上也适合于当前的中国社会问题。1967年美国学者Lynn White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题

为“*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的文章,谈美国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我们当前的环境问题也是深嵌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我们没有基督教传统,那么我们的历史根源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我探讨的课题。

秦:看来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听说您的这部著作,主要是在美国完成的?

陈:是这样的。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成立时,学院让我担任系主任。系新成立,加上有硕士点、博士点的建设、招生、管理等等,总之国内的情况我们大家都是清楚的,是很难有一个没有“干扰”的专心致志写作的时机。我申请的国家留学基金项目获批,所以有机会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应用人类学研究所呆了一年,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

秦:我知道,亚利桑那大学的人类学做得很好,您去的是人类学所?

陈:是啊,我喜欢人类学。申请之前,我从网上搜索了解了美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发现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更加接近于美国的应用人类学领域,所以我后来去了亚利桑那大学的应用人类学研究所。访问学者去诸如“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比较多,我那时的想法是去一个纯粹的美国机构——我想知道美国人是怎样做研究的。

秦:说说您的收获?

陈:我真正关心的是中国本土社会,所以我到美国访问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我知道,我的功力和精力还不足于研究美国社会写出东西来,但我努力去了解美国的社会文化与历史,反观中国社会,以加深理解中国社会。我与应用人类学所的 Timothy Finan、Terry Woronov 和 Diane Austin 等老师有比较多的交流,使我对美国社会有了初步的了解,对中国的理解确实是加深了。2007~2008 学年 Terry Woronov 博士还来我们系访问一年。所以我对水污染问题的历史文化层面的领悟,主要是在那段时期获得的。

秦:您最近做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风格好像又有些改变?

陈:您倒是挺敏感的。“解释”完成了,但水污染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后来我找了个流行语“和谐”,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被批准了。所以从 2007 年下半年开始,我主要做“人水和谐”的研究。做水污染的解释,我的基调是悲观的。在发表我的那篇“内生污染”的文章时,《学海》的编者按称我的文章“向我们呈现江南水乡渐行渐远的忧郁故事”。甚至在日本讲学时,日本的同行也问我,这水污染问题到底如何解决?

秦:是啊,我们的水污染问题什么时候、怎样才能解决?

陈:简单地说,我认为解决水污染的问题必须从解决人的问题入手,即从纠正人的不当行动入手。这人包括个人,也包括群体。“不当行动”,如企业主的偷排行为,环保部门不履行职责、普通居民的不良生活习惯等。不过,您知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定位于科学研究,探讨一般性问题,

所以我没有研究如何去开具体的处方。

秦:您是否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目前从事的国家社科基金“人水和谐”的研究?

陈:“人水和谐”这个说法有点儿命定色彩?似有违韦伯的“价值中立”。不过我们在做“人水和谐”时,我开发了我自己的理解。我选择了两种理想类型进行研究,一种我称之为“人水不谐”型,即人与水环境的互动呈恶性循环:水污染导致疾病,影响经济发展,诱发贫困;随着污染危害的加深,出现人口迁移,进而加剧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平等次生社会问题。一种为“人水和谐”型,即为人与水的互动呈良性循环,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发展生产,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为保护环境提供了动力,也为社会发展提供经济条件。我期望从“人水不谐”与“人水和谐”的类型比较研究中探究解决环境恶化与环境正向变迁的社会文化的一般机理。

秦:我们期待着有关此课题更多的成果出版。2008 年秋天我与您联系时,您正在爱知大学讲学。一般认为日本的环境保护做得比较好,您是否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在日本的感受?

陈:从“卫生”的角度讲,日本的环境几乎是没得挑剔的。天空是湛蓝湛蓝的,或者有云的时候,也能看到蓝和各种云彩。马路干干净净,几乎不需要擦皮鞋。但从“生态”角度讲,和现代性与生俱来的东西,日本与美国一样也没办法避免。比如,国内学者、官员参加访问日本的琵琶湖以后,盛赞琵琶湖治理做得好。但我访问琵琶湖博物馆(相当于科学研究院)馆长川那部浩哉先生并与之进行了交流,我才了解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根本没法解决。当然,我在日本最关心的是水的问题,所以除了上述提到的琵琶湖,我重点考察访问了水俣病的两个发生地水俣市和新泻市。感想很多,细节我就不多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日本的水俣病对中国应该很多的教训与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现在计划把我的一位博士生送到日本船桥晴俊先生那儿去学习,加强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我除了在爱知大学的讲学,还去了早稻田大学与鸟越皓之教授进行了交流,并应邀作了讲座。另外,东亚环境社会学会议 2009 年 10 月正好在日本东京的法政大学召开,这次会议对我们了解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更好地研究中国的环境,启迪颇多。

秦:看来我们今天没办法再继续聆听陈教授关于日本之行的感想。谢谢陈教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

收稿日期 2008—09—01

返修日期 2009—05—20

[责任编辑 秦红增]

[责任校对 刘秀玲]

[作者简介] 秦红增(1967~),陕西合阳人,人类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兼职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陈阿江,见封面作者。